

山城堡一战胜利结束长征

■宗凤彬 贺庆

1936年11月22日,红军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成功打赢山城堡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1军78师主力。这场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有力指导的结果,也是红军主力会师后的革命洗礼,使蒋介石“剿灭红军于立足未稳”的企图彻底破产,为开辟陕甘宁根据地创造有利历史条件。

诱敌深入创造战机。山城堡战役是我军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打出的“破局之战”,既考验红军主力会师后的凝聚力执行力,也考验红军的战略指挥能力。当时,红军三大主力刚刚会师不久,蒋介石调集第1军、第3军、第37军、东北军第67军、骑兵兵共5个军的优势兵力,一路尾随追击,妄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又十分疲乏之际,把红军尽早拖入决战,一举歼灭。相比之下,红军总兵力不过3万多人,武器装备更无法与敌人相比。面对十倍于我的敌军,红军唯有发挥内线作战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弥补红军兵力和武器装备劣势,才能寻机歼敌一部,以最小代价、最快速度把敌人打疼打狠。所以,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军先向甘肃拉池、海原地区退避,敌人紧紧跟踪。红军又继续向预旺堡、同心城地区转移,敌军接着分别向同心城、预旺堡迂回,红军又再次改变计划,继续向东转移,寻求新战机。



山城堡战役纪念碑

役时指出,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胜利。

比拼意志勇夺胜利。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场歼灭战,同时也是我军以疲惫之师对精锐强敌的战场逆袭,充分证明红军将士经长征后革命意志的无比坚定。当时,红二、四方面军刚结束长征,粮弹被服供应等都很困难,红一方面军自会师以来,一直担负掩护任务,转战一个多月,已十分疲劳,参战部队普遍抢粮缺乏、食不果腹。山城堡战役期间正值严冬,夜间十分寒冷,红军指战员冒着风雪严寒向预定战场集中。山城堡地处干旱地区,饮水有极大困难。当敌军78师先头部队贪图泉水水源驻扎在山城堡,不顾侦察地形、敌情只顾大睡时,红军指战员们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冻得浑身发抖,许多人由于喝山水患上腹泻、浮肿,却依然克服极端困难条件,保持战斗状态。

战斗打响后,红军将士怀着对革命的理想、对胜利的渴望,充分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一声令下扑入敌阵,充分发扬我军夜战近战优势,借着夜色勇猛穿插分割,与敌人肉搏拼杀。红军干部带头冲锋、身先士卒,为部队作出表率。红1军团2师第5团政委陈维桢率一个排,在敌阵中打开缺口,最后不幸壮烈牺牲。当敌人凭借优势武器装备和有利地形负隅顽抗时,红军没有重武器,打得十分艰苦。红1军团4师作战参谋彭德怀小分队爬到后山,出其不意出现在敌人背后,一顿手榴弹炸得敌人晕头转向。在我军勇猛攻势下,敌军抵抗一阵后,很快就土崩瓦解,向山腰溃退。经一夜战斗,78师主力几乎被全歼,大量武器弹药被红军缴获。参加这场夜战的红军1师13团政委魏洪亮回忆说,胡宗南的所谓“精锐”,白天打阵地战还有一套,可是,夜战碰上红军这些夜老虎,他们就绵羊也不如了。在山城堡战役胜利第二天的庆祝胜利大会上,朱德讲道,三大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给进击的胡宗南部队以决定性的打击。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作者单位为吉林省舒兰市人武部)

国民党军方面对我诱敌深入之计并非没有防备,最初计划也是各路部队保持统一、相互策应。但随着红军大踏步向东转移,国民党军一路进军顺利,蒋介石认为,“目前已是剿匪的最后5分钟,胜利已在望”。蒋嫡系将领胡宗南误判红军溃退,贪功心切之下既不向西北“剿总”请示,又不顾友邻后续部队跟进速度,下令分三路追击红军。敌78师师长丁德隆更是自诩装备精良,还有飞机支援,根本不把红军放在眼里,一路紧紧追赶。红军抓住胡部孤军深入这一战机,选择在陕、甘、宁三省交界附近的山城堡地区设伏。为确保此战胜利,红军计划集中3个方面军主力歼灭冒进的敌78师,同时以红28军打击敌另两个师。在山城堡战役的兵力对比上,我军形成以3万多人对敌4000余人的数量优势,且我方以逸待劳、敌方长途跋涉,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逆转,歼敌战机终于出现。山城堡战役的诱敌过程,正如《孙子兵法·始计篇》所言:“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骄傲轻敌的敌78师在红军引诱下,一步步踏进埋伏圈。

政治攻心分化敌营。山城堡战役胜利,是我军两条战线同时努力取得的战果,一是军事真枪的军事战线,另一条则是争取人心的政治战线。历史证明,蒋介石枉顾国家民族利益,不思抗日,一

意孤行剿灭红军的做法,在政治上不得人心。我党我军团结抗日的政治攻势,贯穿山城堡战役全程。早在此役打响前,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在全国人民中得到积极响应,即使在进攻我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中,也引起日益强烈的反响。我军高级将领一再联名发电,要求国民党军停止围剿红军,枪口一致对外。被迫与胡宗南部一同进军的右路东北军王以哲部受我军民抗日主张感召,在山城堡战役中一直与红军保持联络。我军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对王以哲部做好统战工作,双方及时通报消息,避免开战。我军主动放弃预旺堡后,提前告知王以哲部,使其能够抢先占领,以便王以哲部向蒋介石“交差”。在战役发起前两天,彭德怀又发电给王以哲,告知“红军举行此次战役,目的是歼灭胡宗南的部队”“请贵军推迟进军的速度,以免引起误会”,王以哲心照不宣地放慢追击步伐。在78师陷入我军包围后,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和胡宗南接连发电给王以哲,请他火速增援,王部以“电台故障”为由默不作声,实际上一直与彭德怀保持联络,连续3天按兵不动,坐视红军歼灭78师主力。多年后,聂荣臻在回忆山城堡战



鳄鱼攻击上千日军

1945年2月19日,太平洋战争已接近尾声。在孟加拉湾海域巡逻的英国舰队截击一支企图从海上撤回的侵略日军。双方展开激烈炮战,很快日军多艘舰艇被英军击沉。无力抵抗的日军不得不逃窜到附近兰里岛。

登岛后,日军依托地形设立两道防线。入夜,当疲惫的日军躺在地上准备好好睡一觉再应付第二天战斗时,成千上万只鳄鱼突然蹿出水面凶猛地扑来。原来,天黑后随着潮水退去,一群群鳄鱼被岸上死伤士兵身上散发的血腥味引来。尽管日军拼命向鳄鱼射击,但还是招架不住大量鳄鱼的轮番攻击。顷刻间,惨叫哀号之声响彻整个海岛。上千名日军被鳄鱼吃掉,只有爬到树上的20多人活了下来。

“橡皮人”给埃军带来沉重打击

1956年10月31日,为维护在苏伊士运河的特权,英法联军与以色列联合对埃及发起猛烈进攻,史称第二次中东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

出于争夺苏伊士运河的目的,联军决定攻占具有战略意义的塞得港。同样意识到塞得港重要性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在那里集结了重兵防守。11月5日拂晓,塞得港埃军阵地上空出现大量联军“伞兵”。由于夜色朦胧,精神高度紧张,埃军慌忙向“伞兵”降落场方向机动,各种火力一起开火。可当埃军准备庆祝“胜利”时,才发现自己消灭的只是一群橡皮人。上当的埃军急忙转移兵力却为时已晚,联军炮火准确命中埃军目标。最后塞得港大片地区被联军攻占。

诺曼底登陆险些毁在一只狗身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诺曼底登陆前,一名叫做纳塔莉·萨久依安的德国女间谍向德军透露大量盟军要攻打加莱的假情报。纳塔莉表面上是德国间谍,其实暗地里被英国招募,为盟军服务。纳塔莉一直要求把她的宠物狗“弗里森”送到英国,但由于战时英国海关和检疫机构对进口动物有严格的规定,事情一拖再拖。1944年5月底,也就是诺曼底登陆发起前不久,纳塔莉的爱犬死了,她把怨气都撒在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身上,扬言要把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计划告诉德国情报机构“盖世太保”。军情五处的情报人员也发现纳塔莉在用密码与德国特务联络。军情五处立即命纳塔莉的上司约谈她,好在纳塔莉还不至于因为爱犬的死彻底昏头,最后上交了她与德国情报部门联络的密码。(赵艳斌 王小明)



卡吉尔冲突充分暴露出印军各军种协同作战方面的弊端

大国军队总参谋部源起之七: 印度军队参谋部

■王贺 张苗

文人治军,三军分立

18世纪中叶,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文官治军,控制以印度人为主的军队。1947年8月15日,印巴分治,独立后的印度,军队依旧保留被殖民时期的组织形式,文官治军的原则得到继承和发展,文官主导的国防部被赋予全面的军政权和军令权。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强调陆、海、空三军平等独立。1948年,印度废除象征英国军事权威的陆军总司令统辖海、空军的制度,实行三军分立,即军队不设类似于总参谋部性质的统一领导机构,陆、海、空三军在国防部直接领导下分别建立各自的行政管理及指挥体系,军种参谋长作为军种最高指挥官,对上对国防部长负责,下对本军种行使作战指挥职能。

为协调各军种活动,印度在国防部内下设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由陆、海、空军参谋长组成,在兼顾三军的原则下,委员会主席由3人中任职最久者担任。三军参谋长委员会是国防部最高军事咨询委员会,负责就武装力量建设和使用的重大问题向国防部长提出建议。

三军参谋长委员会有名无实

印度设置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初衷,是希望这一机构起到总参谋部的作用,从而代表军方参与高层的国防和战略决策。然而,由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受国防部管辖,处于权力核心的文官集团并不愿军方代表介入决策层,因此,文官主导的国防部往往直接越过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独立行使决策与指挥权,

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被完全“架空”,成为无实权的协调部门。

因委员会主席由任职时间最长的军种参谋长轮流担任,所以委员会主席权力实际同该委员会其他成员权力相当,并无否决权,在协调军种间矛盾时往往只能凭借个人威望、资历沟通,对协调三军行动没有实际帮助。印军各军种为维护本军种利益,会利用所有机会争地位、争预算,不予合作。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作用在不断内耗中受到极大限制和削弱。在作战指挥上,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也难以发挥作用。如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期间,担任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主席的陆军参谋长乔杜里认为,这场战争只是陆军的事,动用海、空军只是偶然之举,并未将战事通报海军和空军。

成立联合国国防参谋部

1999年5月,第三次印巴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印巴军事冲突——印巴卡吉尔冲突爆发。由于没有一位军方参谋长参与战略评估,政府在是否使用空中力量及作战区域等问题上犹豫不决。在5月25日高层批准空军支援陆军后,空军却一度拒绝出动飞机参战,直到受命两周后才开始介入。诸如此类问题充分暴露出印军指挥体制不顺畅、军种间协调不力等弊端,导致印军在占有天时地利的情况下未能取得全胜。

战后,印度政府先是成立由高级防务专家和前政府高官组成的“卡吉尔冲突评估委员会”,不久又成立由外交、国防、内务和财政部长组成的“部长小组”,全面检讨印度在国防和指挥领域存在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破解三军联合难题。

2001年2月,“卡吉尔调查委员会”和“部长小组”就国家安全体制改革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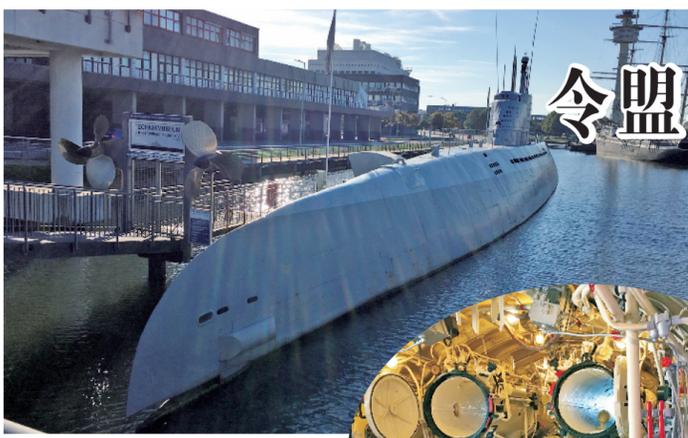
出建议,针对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功能弱化的问题,设立“国防参谋长”,并成立“国防参谋部”指挥三军,从而解决三军分立体制带来的弊端。

文官主导的国防部对强化军方权力心存疑惧,这一重大改革计划遭到国防部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加上军队内部意见不一,各军种相互拆台,成立“国防参谋部”可谓举步维艰。最终,印度政府和国防部折中各方意见,选择渐进式的过渡方案。2001年9月,印度成立“联合国国防参谋部”,下设联合作战部、联合训练部、联合计划部以及战略部队司令部、安达曼·尼科巴联合司令部、国防学院、高级国防学院等联合机构。

“联合国国防参谋部”无作战指挥权,主要任务是负责指挥和协调陆海空三军作战、组织计划、训练、报告等相关事宜,为未来的“国防参谋部”摸索经验,待时机成熟后设立“国防参谋长”,统一指挥陆海空三军及战略力量。但因印度国防部和军队内部争议太大,计划中的“国防参谋长”和“国防参谋部”至今仍未设立。

“联合国国防参谋部”毕竟是一种过渡方案,原计划作为最高军事首长的“国防参谋长”,最后妥协成为中将军衔的“联合国国防参谋长”,反而低于上将军衔的军种参谋长。原拟作为三军统一作战指挥机构的“国防参谋部”,最后妥协成为“联合国国防参谋长”领导的三军协调机构“联合国国防参谋部”,这些障碍直接导致“联合国国防参谋部”成为“空架子”。过去十多年,“联合国国防参谋部”只能勉强维持三军表面联合。

总的来说,在核心权力始终被国防部和军种参谋长牢牢控制的情况下,印军无论是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还是“联合国国防参谋部”,与其他大国参谋机构相比,地位和作用都极其弱势,功能非常有限。



令盟军后怕的21型潜艇

■李巍 韩淑琴

以说21型潜艇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潜艇,对战后各国潜艇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可被视为现代军用潜艇的鼻祖。

21型潜艇配备2台德国MAN公司制造的M6V40型柴油机,单机输出功率为4000马力,主电动机为2台西门子生产的GU365/30型电动机,单机输出功率为5000马力,此外还有2台西门子GV232/28型电动机,单机输出功率为226马力,用于水下静默航行。21型潜艇的电动机功率已远超柴油机,水下航行能力得到提高,因此21型潜艇也被德国人称为“电动潜艇”。

21型潜艇使用主电机时,水下航速可达17.2节,在进行静默航行时也能保持6.1节航速,德军二战时期主力潜艇VII型的水下航速仅为7.6节。21型潜艇下潜深度可达240米,不过根据VII型潜艇的实战经验,21型的实际极限下潜深度有可能接近300米。

21型潜艇采用减少阻力的流线型设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潜艇曾给盟军制造很大麻烦,使盟军不得不花费很多资源用于反潜。当年的德国潜艇大多在战争中被击沉,或者在战后被拆解,能够保存至今的少之又少。而在德国的不来梅哈芬港,仍保存着现存唯一一艘德国21型潜艇,笔者前不久专程前往参观了这艘潜艇。21型潜艇在当时是一种跨时代的

21型潜艇鱼雷舱内景

新型潜艇。之前的潜艇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水面航行,仅在进攻、躲避对方反潜打击等必要的情况下才下潜。21型潜艇则专为长时间潜航设计,通气管使其不必浮出水面就可启动柴油机为电池充电,配合大容量蓄电池,该型潜艇可在水下航行数日不必上浮。此外,21型潜艇采用能够减少水下航行阻力的流线型设计,有效提高水下航速。可